

在宏大叙事中抉隐探微

——读樊树志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

■毛志辉

樊树志先生是明清史的大家，尤以晚明史的研究见长，数十年来持续耕耘于这一领域，著作等身，创见颇丰。新近出版的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图书，可谓皇皇巨著，代表了他几十年研究的总结性成果。

按樊先生所言，之所以将丛书名定为“重写晚明史”，是相对于先前出版的《晚明史》而言的。《晚明史》出版后，受到普遍欢迎，并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。但樊先生坚持认为，该书还有很多可以修订完善的地方，于是决定再下几年苦工，涉猎史料，重新构思，把原来的两卷本扩充为五卷本。

秉承其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，与写作方式，“重写晚明史”从实证着手，以生动鲜活的笔法展开叙述，将韵味深长的历史感慨和卓越睿智的史学见识灌注全书，对万历年（1573）至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的晚明历史进行精彩地阐述和再现。正如樊先生所说，他追求的目标是“把历史鲜活而生动地呈现出来，使得历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”。因此，他努力从大量史料中搜寻各种细节（包括对话与情节），并希望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。

叙事生动成为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的一个显著特点。严肃的历史研究，往往在行文写作上过于艰深晦涩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历史知识普及的难度。樊先生的作品，从《万历传》《崇祯传》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，到《国史概要》《国史十六讲》《晚明史》《晚明大变局》等脍炙人口的史学著述，其学术普及的宗旨一脉相承，在史学体例上不断追求创新，在文风上力求向大众普及，



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改变和坚持，其贡献和价值更是在一些同类著作之上。

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历史故事场景的还原，对一个个桥段的呈现可谓赏心悦目而又精审到位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大多采用时人的原话，可谓形神兼备、声情并茂、栩栩如生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如描写王锡爵出任内阁首辅后第一次与万历皇帝当面对话，很好地展示了君臣之间的博弈。王锡爵处处为皇帝考虑，对于“皇上受了无数烦恼”，“平白受人这等闲气”，耿耿于怀；但是皇帝不肯接纳他的建议，尽早册立皇太子，让他感到非常苦闷。他又反复写奏疏，有礼有节地申明观点、劝说皇帝，终于取得了一点进展，让皇帝同意了皇长子在册立前先

出阁讲学。在樊先生笔下，君臣之间的冲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，文笔细腻生动，叙事引人入胜。而书中类似这样以叙事式笔法对事件的还原可谓俯拾皆是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。

再如，“救时相”张居正的“夺情”政治风波是晚明史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，在当时曾震动朝廷上下，民间里巷也沸沸扬扬。樊先生广泛利用《明神宗实录》《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》《皇明大事记》《定陵注略》《万历邸钞》《石匱书》《赵忠毅公诗文集》《毗陵人品记》《明史》《赐余堂集》《万历疏钞》《松石斋集》《国朝内閣名臣事略》《涌幢小品》《皇明大事记》《王文肃公文集》《味槩斋文集》《艾熙亭先生文集》《静志居诗话》《邹忠介公奏疏》《启祯野乘》《五茸志逸》

《重写晚明史：新政与盛世》
《重写晚明史：朝廷与党争》
樊树志著
中华书局出版

等大量资料，对张居正“夺情”政治风波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作了梳理。在反对“夺情”的人中，有一些打着维护纲常伦理的幌子，企图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，从而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；有一些人从纯粹道德层面出发犯颜直谏，令人尊敬；而张居正在衡量了新政与守制的轻重后，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策划“夺情”之局，固执到底，毫不退让。樊先生最后得出如下结论：“（张居正的）手段固不足为训，精神却令人感动，显示了对各种谤议在所不顾的政治家风度，也流露出这位铁腕人物对权位的贪恋心态。”由此，也让我们对张居正“夺情”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有了清晰的认识。

“重写晚明史”对晚明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，如张居正和高拱斗法、万历新政、万历与张居正的恩怨、万历三大征、明末三大案（楚王案、妖书案、挺击案）、东林书院与“东林党”等问题，都有精彩呈现，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。如在评价张居正的功过时，将史上各家的评论信手拈来，说他“偏衷多忌，小器易盈”，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骤乘”“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”（《明神宗实录》），“工于谋国，拙于谋身”（谈迁《国榷》引海瑞语），“操弄主上……铃制太过”（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），寥寥数语就清晰地概括了一代名相的为官特点和历史地位。又如，不少人习惯上将“东林

党”看作一个政党，樊先生则认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，并采黄仁宇之说，认为“东林党”的“党”是朋党而不是政党，“东林党”只是政敌强加于东林书院的称谓，而非东林书院君子们的自诩。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。

“重写晚明史”是对《晚明史》的扩充，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，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，都有了重大变化。如关于张居正改革中的“一条鞭法”，《晚明史》的论述就已经较为详尽，综合了各类档案资料，并对日本学者的相关观点和研究予以充分注意。但遗憾的是，对“一条鞭法”的研究有着奠基性作用的梁方仲先生的相关成果，却没有加以引用。在“重写晚明史”中，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和纠正，不仅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得到了引用和体现，而且对“一条鞭法”在实行中的利弊等都有了更完善的辨析和解读。

梁启超说：“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，以供现代人之资鉴。”而“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，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”。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从求真求实的立场出发，不仅有宏阔系统的历史视角，更有精微审慎的实证分析，客观冷静地还原晚明时期的历史真实，堪称是史学研究领域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对朝内党派纷争、官员腐败无能、社会政局动荡的纷繁画面的条分缕析、抉隐探微，让我们看到有着大好局面的明朝是如何一步步从繁盛走向衰败，并最终令中国一次次地失去接近世界、融入世界之机会的历史事实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反思晚明的历史，对我们今天而言“实有重大的意义”。

《中华传世藏书》：古今华夏，文传百家

■许芳洁

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或由史官妙笔生花、诗礼传家，或由百姓躬身实践、口耳相传。经过了千百年的积累，古书典籍、稗官野史可谓汗牛充栋。近期出版的《中华传世藏书》是凝聚了无数文化学者的心血、历经八年编纂而成的一套大型丛书。它荟萃了中华文明之精华，囊括了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历史上最具有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典籍，从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艺术等各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就。

说起编纂这套典籍的缘起，丛书总顾问许嘉璐在序言中指出：中国历代编纂的丛书，名声最大的，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合力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收书3460余种，字数超过7亿。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编辑出版工程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但是，《四库全书》过于庞大，后人使用甚为不便（其实其编纂的主要目的只是保存之，并供极少数人使用）。此外，自《四库全书》编成至今，两百多年来又有不少《四库全书》未收却很重要的典籍被发现，又有大量新的重要典籍问世。对于今日之中国和世界，《四库全书》已既不太实用，不便于普及，也不“全”了。时代呼唤着今人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，再一次精选



《中华传世藏书》
许嘉璐总顾问 尹小林主编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中国常用而重要的典籍，以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智慧进行细致、严谨的整理，编出一套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而又足以传世的丛书。它将成为我国典籍永续传承链条上不可缺少，甚至是相当耀眼的一环。

《中华传世藏书》于是应运而生。这套丛书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，分经部、史部、子部和集部，各部下分设若干子类，共选收中国传统典籍近700种，计166册，约2亿字。其囊括的知识范围之广、内涵之深、条理之清晰都是历史上少有的。其外观设计精致恢弘，装帧典雅，封面以金色织锦为面料，以双龙戏珠为图案，工艺为烫金、

红双色漆片，封底压凹，雍容大方。全套卷帙浩繁，气势恢宏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全书在编排上采用简体横排、精选精校并加注标点的方法。《中华传世藏书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孤本、足本和原著，而汉语言文字经历了繁体字改简体字的重大变革，迄今能读懂繁体竖排而没有标点的古书的人已为数不多。编者的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中华传世藏书》记载了中华五千年帝王将相、世间草莽、乱世枭雄、豪商巨贾的成与败、悲与喜。在历史的天空下，与古人作跨时空的对话，可以为现今建功立业者提供智慧的参考，让他们汲古人成功之营养，避历史失意之覆辙。所以，丛书的结集出版，能让更多的人在古色古香、厚实沉重的文化典册中触摸中华文明的历史沧桑，感受先哲的精神世界；在精选精校的文字标点间，品味历代文化的陈年墨香，体悟玄妙的中国智慧；在气势恢宏、美轮美奂的巨著前，洗涤凡间尘世的杂念，抒发久积的文化情怀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普及性古籍整理项目，《中华传世藏书》不只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史的记录，更是对古代人民凝聚而成的智慧与文化的

传承。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传世典籍、文物最为丰富，时间跨度最大的国家，有越来越多的人涉足并乐在其中，讲授者、研究者形成了浩荡的群体。这样的研究，可以言之而成理，也能鉴古而知今，明白地回答我是谁、从哪里来、将到哪里去这些人类由原初就思考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；看清楚当今国家所奉行的一切准则、所瞄准的一切目标，都是在几千年来先贤圣哲的体验、总结、冥思、践行成果的基础上的再发展、再超越，从而在一个新的层次、新的境界上增强文化的自信、自觉与自强。

在与世界文化不断交流、碰撞和融合中，中华文化的“家珍”——传世的典籍依旧是后盾，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。只有有了这坚强的后盾，中华文化才能海纳百川，汲取世界优秀文化，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。当然，时代变了，语言变了，学习思考方法也变了，对中华文化无论是“传”还是“承”，都需要把保存在典籍中的宝贵的传统和思想，用新的方式、新的工具和新的话语进行叙述、阐释、翻译。

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，《中华传世藏书》将目标定为当代及后世读者，力图让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走出一条长远发展之路。